

从“生产力”到“新质生产力”：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当代发展

■ 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杜晓文

生产力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马克思系统阐述了生产力的内部要素构成及其与生产关系的外部辩证关系,形成了科学完整的生产力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实践中,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与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持续推进该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在此基础上创造性提出了“新质生产力”这一重要概念。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经典论述,不仅为理解新质生产力提供了理论基础,也对引领社会发展和推动历史进程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人类改造自然、获取物质资料的能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构成辩证统一的整体,共同形成社会生产方式。其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这一基本原理深刻揭示了社会

发展和变革的内在规律。值得特别指出的是,马克思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明确提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这一论断科学预见科学技术在未来生产发展中的关键地位。总体来看,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包含两个基本维度:从内部结构看,生产力由基本要素构成有机整体;从外部关系看,生产力在一定的生产方式框架下运行,体现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初期将生产力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通过变革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为我国的工业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大论断,为推动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随着实践的发展,党的理论创新不断深化,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提出中国共产党始终

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都在不同历史阶段深化了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认识。

二、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与时代特征

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代表着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在新时代的重大创新。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的生产力形态,其核心要义体现在“新”和“质”两个维度。

“新”体现在新技术、新经济、新业态。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技术等为代表的颠覆性技术正在引领产业变革,数字技术与生产力基本要素深度融合,形成数字生产力这一新形态。这种“新”不是简单的技术更新,而是整个生产方式的系统性变革,代表着生产力发展的新方向。

“质”强调根本性的质量变革。新质生产力不是简单的量变积累,而是质变飞跃,体现着发展方式的深刻转变。它更加注重创新驱动,

突出科学技术的主导作用,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这种质变不仅体现在技术水平上,更体现在发展理念、产业形态和经济结构的全面升级。

从内部要素构成看,新质生产力对传统生产力三要素提出了全新要求。劳动者需要成为掌握新技术的新型人才,劳动资料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工具为主,劳动对象随着认识能力提升而不断扩展。这种要素结构的深刻变化,标志着生产力发展进入新阶段。

三、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与时代意义

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从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人才培养等多方面系统推进。

首先要强化科技创新,加强原创性、颠覆性技术创新,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加大研发投入,完善创新体系,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其次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通过完善生产关系来促进新质生产力

发展。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建立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制度环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第三要大力培育新兴产业,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要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

第四要夯实人才支撑,培养造就大批高素质人才。要完善人才引进、培养、使用机制,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为新质生产力提供智力支持。要营造有利于创新的环境,激发各类人才的创造活力。

新质生产力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在理论层面,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在实践层面,它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提供指导,为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只有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才能突破发展瓶颈,培育新动能新优势,最终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这一理论创新不仅对中国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也为世界发展中国家推进现代化提供了新选择。

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基本原理,结合新的实践不断丰富发展,充分发挥新质生产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公共管理:社会发展的隐形引擎与时代应答者

■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郭瀚文,暨南大学党内法规研究中心 王高贺

公共管理深刻塑造着社会发展的轨迹与温度。它不仅是政策落地的执行者,更是社会需求变迁的感知器、治理困境的破题者与发展动能的激发器。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如同江河与河道,水流奔腾不息塑造河床形态,而坚固智慧的河道则引导水流滋养更广阔的土地。

一、社会发展:公共管理变革的原动力

社会形态的每一次重大跃迁,都向公共管理抛出尖锐挑战,迫使其理论工具与实践模式随之进化。

工业化的呼唤:效率与秩序。伴随工业革命浪潮,人口向城市聚集,社会分工细化,公共事务复杂度激增。传统经验型、人治化的管理难以为继。这催生了以威尔逊政治、行政二分和韦伯官僚制为核心的经典范式。它如同一台追求精密运行的行政机器,通过层级化、专业化、规则化,为社会大生产提供了必需的稳定秩序和基础服务,如公共卫生、基础教育、基础设施等。

全球化与信息化的冲击:竞争与连接。全球化加剧了国家间、地区间的竞争,迫使政府思考如何提升自身“竞争力”以吸引投资和人才。同时,信息技术革命深刻改变了信息传播、社会互动和公民期望。社会要求更透明、更便捷、更个性化的服务。这推动了公共管理向电子政务、数字治理转型,并强化了

绩效管理 and 顾客导向思维。

风险社会的挑战:复杂性 with 韧性。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危机、网络安全等新型风险凸显了社会的复杂性和脆弱性。这些挑战往往跨区域、跨部门、高度不确定。社会发展对公共管理的预见性、协同性、快速响应能力和系统韧性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要求,推动着整体性治理、敏捷治理、韧性治理等新理念的实践。

二、公共管理:塑造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

公共管理作为塑造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绝非被动适应社会变化,而是通过理念创新与工具革新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杠杆。

首先,为发展筑牢基石,通过法治建设、治安维护和产权保护保障社会稳定与经济活动有序开展,依托规划、投资和管理提供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支撑,并以教育普及、医疗保障等公共服务提升国民素质与健康水平,夯实可持续发展根基。

在资源配置层面,公共管理通过科

学预算、税收政策和绩效管理,将资源精准投向教育、医疗等关键领域,同时运用补贴、规制、公私合作等多元工具,引导市场与社会力量服务公共目标,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平衡。

其次,激发社会活力的催化剂,通过精简审批、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优化营商环境以释放市场与创新活力,通过购买服务、政策支持等方式赋能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与治理,更借助听证会、网络问政等机制促进公众参与,汇聚民智以提升政策合法性与社会凝聚力。

再次,公共管理还引领着社会转型方向,凭借国土空间规划、产业政策等引导社会向绿色低碳、创新驱动、区域协调转型,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调节收入分配、兜住民生底线以维护公平正义,同时建立健全应急管理 with 风险预警机制,增强全社会抵御风险的韧性。

三、面向未来的融合: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的共进化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社会

发展与公共管理的互动关系愈发紧密,也面临新挑战。

技术双刃剑:赋能与伦理。大数据、人工智能带来精准治理和效率革命,但也引发数据安全、算法歧视、数字鸿沟等伦理与社会问题。公共管理需在拥抱技术的同时,前瞻性地构建伦理框架、监管规则和包容性接入机制,确保技术服务于人而非异化人。

治理复杂性:碎片化 with 协同性。社会问题日益跨界(如气候变化、跨境犯罪),传统的条块分割管理模式捉襟见肘。推动跨层级、跨部门、跨地域、跨公私边界的协同治理和整体性治理成为必然要求。这需要打破信息壁垒、重塑组织流程、建立有效的协同激励机制。

价值多元化:共识 with 张力。社会价值日益多元,不同群体诉求差异甚至冲突加大(如发展与环保、效率与公平)。公共管理需超越简单的技术理性,提升价值权衡、沟通协商、凝聚共识的能力,在多元张力中寻求

最大公约数,维护社会基本团结。

公民角色升级:从参与者到共创者。公民不再满足于咨询和投票,更希望深度参与公共价值的定义和解决方案的共创。公共管理需要设计更开放、赋权的参与机制,将公民视为治理生态中的核心伙伴和共同创造者,释放社会智慧和行动力。

公共管理与社会发展,是一场永不停歇的双人舞。社会发展的浪潮不断冲刷着公共管理的堤岸,重塑其形态;而卓越的公共管理,则如精密的导航系统与强劲的引擎,引导社会巨轮穿越风浪,驶向更繁荣、更公平、更可持续的未来。理解这二者的互动关系,不仅关乎政府效能的提升,更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生活的品质与社会的长远福祉。在变革的时代,唯有不断推动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创新,使之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才能有效应对挑战,把握机遇,共同书写人类文明进步的新篇章。

(本文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